

红流纪事

将星的摇篮

黄埔军校

武国友/主编 孙艳玲/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文史出版社

★
红流纪事

将星的摇篮

黄埔军校

武国友/主编 孙艳玲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星的摇篮 黄埔军校/武国友主编

——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11.3 (2011.7重印)

(红流纪事)

ISBN 978-7-5472-0466-5

I ①将… II ①武… III ①黄埔军校—史料

IV ①E29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3393号



将星的摇篮

黄埔军校

JIANGXINGDEYALAN
HUANGPUJUNXIAO

主 编/武国友

著 者/孙艳玲

出版人/徐 潜

责任编辑/康迈伦

责任校对/李洁华

装帧设计/柳甬泽 徐 震

印装/长春市东新印刷厂

开本/720mm×1000mm 1/16

字数/75千字

印张/7

版次/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3次印刷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联系电话/0431-86037516 13578885062

www.jlws.com.cn

书号/ISBN 978-7-5472-0466-5

定价/15.00元

丛书主编/武国友

副主编/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

著者/孙艳玲

编委会

主任/武国友

副主任/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

委员/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

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

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

总序

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，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，继承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，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，我们组织编写了《红流纪事》丛书，以志纪念。

近些年来，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，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。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，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一本综合性的小册子，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，目前尚不多见。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，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。

选择中共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，需要做些筛选。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，我们这套《红流纪事》丛书所选之“重大事件”，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，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。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。就我们的水平而言，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、恰当。但总体设想是，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，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。

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，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，经过反复综合、权衡，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：一是体现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。二是注重代表性。所说的代表性，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，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，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。三是注重平衡性。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：其一，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

交叉。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，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，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，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我们在撰稿过程中，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。其二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，工农运动、军事斗争，国民革命运动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，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东北抗日联军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、各大战役，等等，都有所选取，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。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，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，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。

本书编写过程中，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。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，力求做到准确、直书。严格地说，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，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。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、严肃性，又力求文字朴实、通俗易懂，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，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，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，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。当然，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在此，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、朋友们，致以深深的谢意！

编者

2011年3月于北京

目 录

★ 孙中山联俄	9 /
★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	17 /
★ 创办黄埔军校	33 /
★ 汇集四方人才	56 /
★ 战场上的黄埔学生军	87 /
★ 黄埔今昔	103 /



孙中山联俄

1923年9月，蒋介石第一次访问苏联，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。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出访寄予了很大希望，他特意致信列宁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，介绍他的这位“参谋长和密使”。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确实帮了他的大忙。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，蒋介石“巧妙地利用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”，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联共（布）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，参观了苏联红军，可谓国民党军官当中真正了解苏联红军情况的人。此行的结果，“加上在国民党内的关系，使蒋介石担任了颇为有利可图的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”。



(一) 向莫斯科派遣使团

20世纪20年代初，列宁和孙中山在各自的国家里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，而且彼此之间都关注着对方的革命。1912年7月，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《涅瓦明星报》上发表文章，称赞孙中山是一位“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”。他还说，孙中山颁布的革命纲领，“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、真诚的民主主义”。1917年11月发生的十月革命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关注。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，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《民国日报》就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。1918年1月和3月，孙中山两次指示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的动向，以期互相援助。7月，他致电列宁，表示“十分钦佩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”，认为苏俄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榜样，使这些革命的人民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“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”。

在孙中山看来，俄国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权和民权。所谓人权，就是实现“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”；民权则是“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”，而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这些。所以，孙中山在1918年7月致列宁的电报中肯定了“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”，并且建议“中国革命党和俄国共产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”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西欧战胜国目光纷纷转向中国，企图恢复其在中国的特权，唯独苏俄对中国表示了友好。对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，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反应。1918年7月4日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

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，在俄国发生的事件首先在亚洲邻国产生了反响。在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南方人民已经自觉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。“前几天，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声明”。8月1日，契切林致信孙中山，称他是“敬爱的导师”、“中国革命的领袖”。契切林在信中介绍说，俄国革命目前遭到了国内外敌人的围攻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在这个“力量悬殊的斗争”时刻，“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”。他建议中俄联合起来，“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”。

与此同时，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。对于这个宣言，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认为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，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，“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”。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，在东方国际政治史上，“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”。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，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。

不仅如此，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，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。据波达波夫说，1919年底至1920年初，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，他认为孙中山是“一位狂热的反英者”。在接触中，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。一位是廖仲恺，另一位是朱执信，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。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、土地法令、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。

1920年夏，俄共（布）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。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，准备把中国华南、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



力量联合起来，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。刘江在给俄共（布）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，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逗留一段时间。

到了1921年，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。4月21日，俄共（布）党员索科洛夫－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，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。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。据李章达反映，他本人想去莫斯科，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。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，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。那里有4万名中国国民党员，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，并且在那里“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”。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，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。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，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，他们“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，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”。李烈钧还表示，他到广州后就提出“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”。所以，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，“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”，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“最迫切的任务”。

5月5日，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。8月28日，他致信契切林，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，并且告诉莫斯科，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，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，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。他在信中还写道：“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，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、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。我希望知

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、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
一切。”为此，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，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
其他友人“获得私人的接触”。

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，苏俄政
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。10月31日，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
交部长扬松，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。他问道：如
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，同北平的联系会不会中断？11月6日，
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：我们在北平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
州政府进行往来。

1922年2月7日，契切林告诉孙中山，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
会拜访他本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。
4月25日，达林奉命来到广州，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。两天
之后，即4月27日，达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
会谈。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、工作情况，双方讨论了苏维埃
政权和红军的问题。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达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
星期都要会谈两次。在此过程中，达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，向孙中山
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。孙中山表示赞同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
科的援助。

（二）马林、越飞来华

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
作用。7月17日，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



报告。马林在报告中说，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”。相反，他对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，认为这里的工作“大有可为，而且能够成功”。他还发表文章，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。

马林的报告和建议，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。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，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、共产国际合作。

1921年12月，孙中山在桂林同马林会谈时，马林曾建议孙中山“创办军官学校，建立革命军的基础”。此后，廖仲恺同越飞一起赴日本，商谈国民党同苏俄、中国共产党合作事宜，并且讨论了苏俄援助孙中山建立军官学校的问题。

孙中山虽然掌握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，但装备相当落后。因此，他想组建一支独立而又可靠的武装力量，并且希望莫斯科能为这支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和武器弹药。为此，孙中山提出了三条线路，其中最长的但也是最可靠的一条线路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进入中国。他说，如果他的观点苏俄可以接受的话，他将派一名军事专家去长春同格克尔一道为莫斯科制订一项计划。孙中山还询问格克尔，俄国能否制造飞机，有哪些火炮，是不是有很多机枪，能否向他提供飞机。

12月20日，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再次提出援助问题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。”并且能够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。但是，这需要得到武器、弹药、技术、专家等方面的援助。孙中山在信中询问越飞，苏俄能否通过库伦支援他？如果能，支援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些方面。如果莫斯科重视他的计划，

就请派一位权威人士来，“从近日采取行动的角度对这个计划作进一步的讨论”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孙中山又致信列宁，明确提出，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“派一名全权代表赴莫斯科，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”。

这时，欧洲革命形势出现低潮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于稳定，而东方国家的革命却蓬勃发展。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，莫斯科希望在东方寻找自己的同盟者。在此情况下，莫斯科更加注重中国革命。

继马林之后，越飞又同孙中山举行会谈。1923年1月16日，拥护孙中山的军队打败了叛军陈炯明，收复广州。当天，越飞抵达上海。从1月18日至27日，越飞同孙中山多次举行会谈。1月26日，越飞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称，孙中山准备打通同苏俄的联系。具体计划是：将位于四川的10万军队开到中国西北边境，然后通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，在同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，以便从苏俄取得武器弹药。

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。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则完全指望苏俄的帮助和支持，首先需要装备10万人的军队。所以，有关苏俄的援助问题就成了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孙中山告诉越飞，他准备对他的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，还打算举行北伐反对北平的军阀集团。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专家组织军队，所以这项计划一直难以实现。因此，他希望莫斯科在财政和顾问方面提供援助。

越飞声称，俄国革命取得胜利，是因为有组织良好的军队和政党。他对孙中山说，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个好的革命政党。他承



诺，莫斯科可以向孙中山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。

于是，越飞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援助孙中山的计划提出了三个问题：（1）苏俄政府是否准备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？（2）苏俄军队是否向张作霖发动进攻，把他从北京引出来？（3）苏俄是否在一两年内为孙中山的10万军队提供武器装备，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么我们在何种规模和在什么时期内提供武器帮助？

越飞还在报告中说，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。如果中国的革命现在只是由于我们的帮助而取得胜利，那么这正意味着，是我们把世界帝国主义摔倒而使其双肩着地的，我们在全世界将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卫士。“如果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只是因为我们拒绝而不能取得，那么这将意味着，帝国主义要比我们强大得多，是它战胜了我们，而不是我们战胜它，因此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不能指望任何人”。越飞相信，孙中山不是凯末尔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“我们的人，是革命家”。如果莫斯科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，“他决不会背叛我们”。“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200万卢布吗？”基于这样的考虑，越飞提醒莫斯科注意，不管现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，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中国。所以，“我们决不应因此而忽视远东的事务”。